

## 高等教育入學：學生的選擇

張玉婷

浙江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

中國內地高等教育於 20 世紀 90 年代末開始急速擴張，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不斷增加的同時，其內部亦不斷層級化。本研究選取 23 名大學一年級學生，通過訪談，以實踐邏輯理論為基礎，探討各種結構性因素對學生高等教育選擇的影響及其作用方式。研究表明，選擇行動中的目標、信念和信息受地區、學校、家庭等因素影響，而並非完全出於理性選擇，實踐邏輯理論可以對學生的選擇行為作更深入的解釋。

關鍵詞：高等教育；機會均等；高等教育選擇；實踐邏輯理論

中國在 20 世紀末經歷了高等教育的擴張，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問題並未因為入學機會增多而淡化，反而日益受到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究其原因，是高等教育體系在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其內部亦在層級化。從個人行動入手是討論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問題的思路之一。本研究以學生在高等教育升學時的選擇行動為切入口，以實踐邏輯理論為解釋依據，討論了影響學生選擇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

### 文獻回顧

#### 高等教育選擇研究

從 20 世紀 60、70 年代開始，高等教育選擇 (college choice) 逐漸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有關高等教育選擇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經濟學取向和社會學取向 (Hossler, Braxton, & Coopersmith, 1989; Jackson, 1982; McDonough, 1997)，經濟學取向主要從收益計算方面分析選擇行為，認為高等教育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社會學取向則側重教育期望的形成，其中較為重要的是以 Blau-Duncan 模型為基礎的 Wisconsin 模型，即地位取得 (status attainment) 研究 (Blau & Duncan, 1967; Sewell, 1971; Sewell, Haller, & Portes, 1969)。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有關高等教育選擇的研究以建立整合模型為主，

開始關注選擇的具體過程以及每個階段的影響因素（Chapman, 1986; Hanson & Litten, 1982; Hossler & Gallagher, 1987; Jackson, 1982）。

從 20 世紀 70 年代到 90 年代，有關高等教育選擇的研究以量的研究為主。至於質的研究，方法是從個人選擇入手，分析潛在的因素如何以及為甚麼能夠影響高等教育的選擇（McDonough, 1997）。90 年代之後，不少質的研究發現了這些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Baxter & Britton, 2001; Brooks, 2003; Heath, Fuller, & Johnston, 2010; Pugsley, 1998; Reay, Davies, David, & Ball, 2001; Sheng, 2012）。

## 對選擇行為的理論解釋

對個人選擇行為的理論解釋主要有兩種思路：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和實踐邏輯理論（logic of practice）。

理性選擇理論主要涉及三個概念：信念（beliefs）、願望（wants or desires）和證據（evidence）。經過理性選擇的行為，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該行動必須基於自己的信念，是為了達到個人願望所能採用的最佳手段；（2）根據所能掌握的證據，個人所持有的是最優化的信念；（3）個人必須收集合適數量的證據，證據的數量取決於個人想要達成的願望、所要做的決定，以及收集更多證據所需付出的成本和能夠得到的回報（Elster, 1989, p. 30）。理性選擇理論有助於解釋個人達到目的所採用的手段，但是不能解釋個人偏好、願望、信念、行動邏輯、得到的信息、考慮的成本和收益為何會有差異（Andres Bellamy, 1992, p. 74）。

實踐邏輯理論關注教育過程的複雜性。該理論涉及的主要概念有：慣習（持久的、可轉換的潛在行為傾向系統），它是一種已組構的結構，但又有形塑結構的功能；經濟資本（能夠直接轉化為金錢或者以體制化的財產權存在）；文化資本（個人從處於某一階級位置的家庭中繼承下來的語言和文化能力）；社會資本（因持久的關係網絡而擁有的實際或可能的資源）；象徵資本（各種資本合法化之後表現出來的聲望、名譽、名聲）；場域（亦可稱為力場，是指加之於空間內所有人的一組客觀存在的權力關係，這種關係不能化約為單個行動者的主觀意圖，亦不能化約為行動者之間直接互動）（Bourdieu, 1990, p. 53; 1991, p. 230; 1997; Giroux, 1983）。實踐中的分類（practical taxonomies）反映了社會秩序劃分（divisions of the social order）的結構，但同時亦促成了社會秩序的複製。當客觀與主觀的對應達到極端狀態，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就具備了不證自明（self-evident）的性質，形成一種人們習以為常（taken for granted）的原始信念（doxa）。主觀的行為傾向與客觀的社會結構之間對應關係愈強，原始信念就愈不會受質疑（Bourdieu, 1977, pp. 163–168）。具體到教育領域的實踐，無論是教師對學生的作業給予評價還是學生選擇他偏好的學校和學習領域，都跟客觀的社會結構一致，因為這些實踐正是社會結構在行動者身上的體現（embodiment）。

(Bourdieu, 1996, p. 3)。正是借助社會結構與心理結構的這種一致性，學校系統才得以養成適應社會結構的思考和行動圖式 (Bourdieu, 1996, p. 29)。

## 相關實證研究

不少學者已經依據實踐邏輯理論進行了實證研究。Reay 等研究者通過深入訪談，認為那些不可直接測量的因素，比如自信水平、對事物把握的確定性和對應得權利的意識等，在教育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 (Reay, 1998, 2003; Reay, David, & Ball, 2005)。這些在家庭中積累下來並且由家庭成員共享的態度、經驗和性情傾向，可以視為一種家庭慣習 (*familial habitus*)，它們不僅影響了家長在學生教育過程中的介入程度，以及能夠提供甚麼類型、多大程度上的支持，亦因此營造了學生成長於其中的環境而作用於學生自己在教育過程中的表現和選擇。不同家庭的慣習都不同，所以對一些學生來說，升學時選擇繼續讀書或者進入甚麼樣的學校，都是在此之前的教育過程中已經設想過的、理所當然的決策，決策過程中家庭不僅能為學生提供關於大學學習與生活的各種硬信息 (*hard information*)，而且還能在自己圈子中得到有價值的非正式信息 (*hot knowledge*)；但對另一些面臨經濟情況約束的學生，由於介入不熟悉的領域所產生的焦慮，以及因選擇失誤而可能造成的雙重羞愧感，他們的升學決策更為複雜、充滿風險。

另外，家庭培養模式對子女教育亦有影響，工人階級家長更傾向於採用放任不管的方式，認為教育是專業人士的責任，而中產階級家長則更大程度地參與子女的教育過程，採用的是一種與學校類似的有意識的培養方式 (Lareau & Weininger, 2008)。在決定子女未來教育和職業生涯走向時，中產階級家庭更傾向於鼓勵孩子走出居住的地區，嘗試不熟悉的領域；工人階級家庭則更傾向於讓孩子留在熟悉的區域和領域，以自己熟悉的方式發展 (Reay, 2010)。

關於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入學的問題，中國內地主要有兩類研究。一類是採用描述性統計、邏輯回歸、多元回歸、事件史分析，以職業與社會分層標準為基礎，對家庭階層背景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關係進行研究 (丁小浩, 2006; 文東茅, 2005; 王偉宜, 2010; 李春玲, 2005; 侯龍龍、李鋒亮、鄭勤華, 2008; 楊東平, 2006; 劉精明, 2006)。這類研究遵循的是社會學分析中的社會分層視角 (*social stratification perspective*)，偏重於階級結構的分析取向，沒有關顧到來自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的多層次影響因素，以及個人行動的作用，因此無法解釋不同群體在入學機會方面形成差異的過程。

另一類研究遵循的是經濟學分析視角，關注身為行動者的個人如何進行高等教育選擇。比如使用因素分析、邏輯回歸等方法，分析升學決策中的影響因素 (鮑威, 2010; 鍾宇平、陸根書, 1999)。或者通過因素分析、結構模型擬合程度檢驗，試圖

構建或修正升學選擇的行為決策模型（高妙飛，2007；黃瑋，2008）。雖然這類研究開始關注微觀層面的個人行動，但其基本假設是高等教育升學是在衡量家庭、學生、學校各方情況的基礎上所作的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的選擇，因此忽視了家庭教養方式、家長行為方式、階級身分認同等非理性情感因素，即結構限制的影響，不能解釋各種因素在具體情境中如何影響選擇行為。

## 研究設計

基於文獻回顧，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進行高等教育選擇時學生如何決定求學地點、教育機構和學習領域？選擇行動受哪些因素影響？是否可以用實踐邏輯理論解釋學生的選擇行為？

本研究關注的是學生進行高等教育選擇的行動及其背後的邏輯和意義，研究目的在於通過與受訪者對話，理解他們的選擇行動及當中的邏輯和意義，因此適合採用質的研究取向。上海是研究者最方便開展研究的城市，而且上海高等教育發展完備、高等教育機構層級化明顯、招生形式和政策多樣、生源地廣泛，因此適合作本研究的地点。

研究者採用分層目的抽樣策略，選取包括不同層次的本科和職業院校在內的 7 所高校，採用滾雪球的方法在選定的高校中選取了 23 名大學一年級學生，對學生進行了一對一的半結構型訪談。為保護受訪者，文中提及學生及其就讀學校均以代碼表示。學生代碼由三個字母組成，分別表示所在學校、學生姓名縮寫及學生性別（M 為男，F 為女）。其中所在學校的字母，F、T、H 為「985」工程本科學校，S 為「211」工程本科學校，<sup>1</sup>W 為普通本科學校，X 和 G 為職業學校。受訪者基本情況詳見表一。

獲得數據後，借助 NVivo 8.0 對數據進行初步整理。選取其中內容最為豐富的 4 個案例，通過不斷閱讀數據，提取與研究問題有關的主題和主題之下的概念。依據這樣形成的初步編碼體系對其他案例進行編碼，過程中產生的新節點補充進入編碼體系，最終形成呈現研究結果的框架。

## 研究發現

### 選擇城市

#### 大城市：留守還是闖蕩

由於改革推進度、對外開放度、政府支持度這三方面的制度性因素不同，伴隨着城鎮化進程的是地區間城鎮化水平的不均衡，從各項經濟發展指標來看，東、中、西、

表一：受訪者資料

代碼	專業	生源地	父親職業	母親職業	父親教育	母親教育
FLM	社會學	廣西／城市	工程師	編輯	本科	本科
FSF	中文	黑龍江／城市	科研員	科研員	碩士	本科
FYF	中文	江蘇／城市	高中教師	會計	本科	高中
FYM	歷史	雲南／城市	大學教師	大學教師	碩士	碩士
GHM	珠寶工藝鑑定	河南／農村	農民	農民	高中	初中
GSM	文物鑑定修復	上海／城市	企業員工	護士	中專	大專
HFF	教育	上海／城市	企業管理	企業管理	碩士	碩士
HHF	教育	福建／城市	個體戶	個體戶	小學	小學
SCF	貿易	浙江／城市	—	—	大專	大專
SCM	貿易	上海／城市	工人	工人	高中	大專
SDF	貿易	上海／城市	企業管理	幼兒園教師	碩士	本科
SQM	貿易	上海／城市	大學教師	醫生	博士	碩士
SWF	貿易	山東／農村	農民	農民	高中	高中
SZF	貿易	山東／農村	農民	農民	小學	初中
SZM	貿易	浙江／城市	工人	工人	—	—
TLM	政治	上海／城市	外企管理	公務員	碩士	本科
TZF	政治	新疆／城市	企業管理	企業管理	碩士	本科
WGM	日語	江西／農村	司機	個體戶	初中	初中
WSF	法語	上海／城市	企業員工	企業員工	大專	大專
WZF	對外漢語	重慶／農村	農民	農民	—	—
XLF	教育	湖南／城市	個體戶	工人	高中	高中
XSM	飛機製造	上海／城市	司機	工人	—	—
XZF	教育	上海／城市	公務員	公務員	本科	本科

東北地區的差距明顯（謝京輝，2009）。另一方面，中國現有的戶籍制度限制了欠發達地區公民自由進入並享受「大城市」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實際上形成了鄉村、一般城市、大城市之間的戶籍隔離。城鎮化水平不均衡和戶籍限制導致出生於不同地區的人能夠享受到的生活機會差異巨大。在這種背景下，對於本來就成長在大城市的學生來說，留在大城市是他們最理想的情況。

上海本身具有數量和質量都相對較高的高等教育機構，而各個機構招生名額的分配又傾向於本地學生，因此以同樣的高考成績，上海學生選擇上海的學校獲錄取的機會要大得多：

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習慣心理的問題，有上海的學生你總歸是傾向於上海學校的，這是一種習慣心理的問題。而且你選別的學校風險很大的，成績啊。（TLM）

對於出生於鄉村或者小城鎮的學生，要想打破出生地帶來的限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上大學和就業，進入並留在城市或者大城市。大城市對於許多學生具有很大吸引力，因為在他們眼中，大城市就意味着「國際化」（FLM）、「小資」（FYF）、學歷獲「認可」（GHM）、「機會多」（SWF）；相反，留在家鄉則是「沒出息」（SZF）的表現。

城鎮化發展水平的不均衡帶來的不僅是經濟發展和生活機會方面的差異，還形成了人們對不同城市、地區的價值判斷，趨之若鶩想要鑽進大城市「闖蕩一下」的熱情給予個人通過努力改變命運的期待，但同時將這種以出生地強行決定個人生活機會的不均衡合理化了。

### 出國留學：推拉因素之外

出國上大學已經成為愈來愈多中國家庭在面臨高等教育選擇時考慮的選項，尤其是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但不是所有學生都有能力出國，有能力出國的學生亦未必會選擇這條道路。

FYM 沒有選擇出國讀大學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學業發展有更為完整的規劃：

我對自己的規劃很多年來就是大學在大陸讀本科，然後出國讀研究生。因為我以後想回到國內。說得空一點，我覺得世界的希望在中國，還是想留在大陸。出去開拓一下眼界，應該是去美國吧。（FYM）

學生選擇留學的主要動機是獲得全球化的文化資本，強化他們的階級地位，擴大就業機會（Kim, 2011）。但是當出國的人增多，尤其是愈來愈多工薪階層加入這個行列之後，「留學」本身不再是「有優勢」的保證，因此他們需要不斷根據自身能力、教育市場、就業市場、機會成本等多方面的信息，判斷保持優越地位的可能性，並對自己的學業規劃作策略性調整。

來自浙江的 SCF 和出生於上海的 SQM 沒有出國是因為擔心自己的語言能力：

那個時候悉尼大學今年是首年可以通過高考成績認證，考慮過這個，當時覺得自己的〔英語〕口語還是太差了，就沒有辦法很好地去交流。（SCF）

英語太爛〔太差〕了。托福考不出來。（SQM）

來自山東農民家庭的 SWF 考慮的則是家庭的經濟支付能力：

我是有想過〔出國〕，但是經濟……我家境並不富裕。（SWF）

可見，選擇出國這條道路不僅需要足夠的經濟實力以支持學習和生活的開銷，還需要學生原有的文化資本（包括語言能力、適應異國文化的能力）積累到一定水平。如果沒有具體形式（embodied state）的文化資本來輔助，在現有的環境下，單純的經濟資本投入愈來愈難直接轉換成有競爭優勢的體制形式（institutionalized state）的文化資本了。<sup>2</sup>

因此，學生選擇是否出國讀大學時的考慮並非「推拉」模型（Mazzarol & Soutar, 2002）那樣簡單，在諸多「推拉」因素背後，學生是否意識到這些因素、如何評估這些因素的作用、是否有能力選擇他們認為更好的方案，都與資本積累和位置競爭的意識與能力有關，最後未必以出國留學為獲取競爭優勢的手段。

## 選擇學校

### 自主招生：提前到來的「分房子」競爭

自主招生的教育機構往往都是在高校層級中比較靠前的學校。自主招生一般採用「學校推薦為主，個人自薦為輔」的方式，獲得推薦資格的一般都是當地最好的一所或者一批中學。根據學生的講述，學校推薦常常是根據一些指標將學生在某段時間內的學業成就量化為分數，再進行綜合排名，從排名最高的學生開始優先選擇有限的推薦名額，過程「有點像分房子<sup>3</sup>」（FYM）。可以說，從學校推薦開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競爭就已經展開。

自主招生的考試一般由筆試和面試兩個環節組成，了解考試的內容、有針對性地充分訓練是筆試成功的有效捷徑，針對自主招生的培訓班於是應運而生：

一般來說如果你不報〔培訓班〕根本就不知道它是考哪方面的，因為考試〔內容〕比較雜……他們有可能也會通過老師或者是某些渠道，雖然說不公開，但是他們會有往年的真題給我們做，還有就是告訴我們複習的方向，還有複習的手冊……有用，非常有用。他們有一套很有效的拎重點的方式，基本上屬於我只要聽了他們的課，回家稍微複習一下，我就可以不用看那些書了。（SDF）

如此「非常有用」的培訓是不是每位參加自主招生的學生都能享受呢？

通過好友介紹吧，小範圍〔做廣告〕，大範圍據我所知應該還沒有到人人皆知的地步。他們沒有辦法透露這一屆，但是他們往年的〔題目〕都可以拿得到。（SDF）

這種培訓班只是通過「小道消息」在小範圍內傳播，這就意味着是否可以接觸到這方面的信息、是否有機會參加這樣的培訓，與學生所在的地方是否在廣告「範圍」內、家長的社會網絡中是否有這個「範圍」內掌握信息的人十分相關。

與筆試相比，面試更加靈活多變，即使參加培訓班，亦不像筆試那樣容易能作有針對性的準備：

它是培養你的說話技巧，還有就是面對〔陌〕生人的時候你應該如何跟他交流，應該是留下第一印象吧，至於複習哪方面，他們也沒有把握說一定會考甚麼，因為考的範圍比較廣。（SDF）

SDF 提到的說話技巧、如何與他人交流、第一印象等，與其說是培訓班能夠提供的訓練，不如說是個人在長期的學習生活中積累的一種慣習。

FYM 的面試經歷更詳細展示了面試的內容和通過面試需要的個人素質：

先讓我自我介紹，我說我比較喜歡經濟史，有個老師就問我知不知道凱恩斯，這個當然知道了，這屬於，要想考高考，再常識不過的東西了。他讓我講了一下，對比了一下跟凱恩斯相對的另外一個經濟學派的人物，亞當斯密吧我記得。我又跟老師說我喜歡搞投資理財，做過一些，老師問我為甚麼喜歡。我說我喜歡看電影，老師讓我講講最近一屆的奧斯卡獎，我就跟他預測了一下，預測了4個獎，最後對了3個，我覺得還是蠻高興的。有個老師就追問我一個問題……他說你知不知道沈從文除了寫作之外還幹甚麼？我母親正好是搞中文的嘛，所以我就知道，就跟他說解放以後他〔沈從文〕去故宮搞文物研究去了。我覺得那次表現得還是很不錯的。（FYM）

可以說 FYM 是「有備而來」，這種準備是在家庭文化背景和基礎教育長期的潛移默化影響下積累得來的。這些知識、素養已經以具體形式的文化資本積累在學生身上，而這種沒有特定範圍和形式的考試恰恰「是以社會感覺的不自覺標準為工具對整個人進行整體評價……風格或舉止、口音或口才、姿態或手勢、甚至服飾和化妝」（Bourdieu & Passeron, 1977, p. 162）。於是由家庭教育培養出來、但並非為了這次考試而準備的東西，恰好與學校對「人才」的定義和選拔標準一致，看似偶然的巧合實質上具有其社會結構和階層文化方面的必然性，即 Bourdieu 所說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finalities without consciously posited ends），行動者毋須明確意識到某種原則，就用這種原則指導了自己的行動（Bourdieu, 1990, p. 40）。通過這樣的選拔方式，學校文化與家庭文化得到了相互辨識和確認，同時使得這個挑選「人才」的過程具備了公平和正義的樣子。

### 「好學校」：抹不去的名校情結

對於沒有機會競爭自主招生名額或者參加了自主招生但是沒有拿到加分或錄取優惠的學生來說，仍有機會通過統一高考選擇這些「好學校」。對於成績出眾者，



是否選擇這些「好學校」是一個不需要考慮的問題，他們要決定的只是根據自己的成績，在這些好學校裏最高可以選到哪所學校而已：

這個成績的話在我們那邊反正北大清華報不了，只剩下 R 大學跟 F 大學兩個學校，當時權衡了一下，問了老師的意見，然後我自己又比較喜歡上海一點，就報 F 大學了。（FLM）

我上的文科，我那會在我們班也算是學習不錯的同學，一直想的是北京啊、上海啊，這種大城市，「985」名校應該是我考慮的範圍。如果發揮的比較好的話，有考慮過清華、北大、復旦那種。（TZF）

即使自己的成績不足以選擇這些最有名的高校，學生普遍採用的策略亦是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選擇「好學校」。何以判斷一所學校是不是「好學校」？「名氣」以及「985」、「211」這樣的頭銜是學生比較認可的標準：

當時知道成績的時候就發現特別低，自己預想的那個大學沒有可能考取了，所以就是在自己的分數能上的大學裏面儘量挑好的，S 大學的話它首先是一個「211」的學校……（SCF）

北京的大學挑來挑去，有一個首都經貿，不是「211」不是「985」，然後又看到了 S 大學嘛，畢竟還是個「211」，然後就考慮了一下這邊。（SWF）

這些所謂的「名牌大學」到底為何能得到學生的青睞呢？從訪談資料來看，「名牌大學」吸引學生的主要原因有：學生素質高、學術氛圍濃，「清華大學學生刷得馬桶都比人家乾淨」（WSF）；教師素質高、有好的導師和教授，「教授級別的人比較多」（XZF）；教育國際化、辦學理念好、軟硬件資源豐富，「能提供的機會不一樣」（SWF）；學歷被認可、找工作容易，是很有用的「一塊敲門磚」（SCM）。

儘管有研究表明在教育過程（比如大學生學習投入）方面，中西部學校、地方本科院校表現可能更好，但是這些過程性的評價標準往往無法成為學生選擇學校、政府分配投資、教師流動、人才招聘的決定因素，單一評價標準及其固化使得高等教育選擇和用人單位招聘在某程度上成為一種在分類爭奪中對於學業稱號（academic title）的象徵性競爭（Bourdieu, 1996, p. 119）。

### 本科還是專科：懸崖邊上的選擇

好學校人人都想去，但並不是每名學生都有足夠的成績選擇一所好學校。如果

成績在本科和專科分數線的「懸崖邊」上，學生就要面臨一個問題：究竟上一個本科層次的「差學校」還是上一個專科層次的「好學校」？如果只能考得上專科，要不要上？

這裏所說的專科是指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以職業為導向的高等教育。教育價值上的不受重視使高等職業教育與本科高等教育之間，形成類似於前文所述本科層面不同類型院校之間在生源、教師、教育資源和就業情況等方面的差異。

對於分數在本科線附近徘徊的學生，有的學校為了保證整體升學率和減輕教師負擔，採取的是「像催眠一樣」的規勸方式（XSM），使學生自動放棄報考本科的意願，直接參加 3 月進行的專科自主招生。現在，在職業大學就讀的上海學生 GSM 有過這樣的經歷，他班主任對他說「你高考的時候肯定不會被本科錄取」，他自認為「性格比較軟」，於是就聽從老師建議，放棄了高考。根據政策規定，這就意味着一旦獲專科學校錄取，他的成績即使可以進入本科學校，亦沒有資格參加全國統一高考了。在面對是否要嘗試本科高校的問題上，GSM 選擇了「自我淘汰」，但是這種淘汰並非完全自願的，而是在教師的引導下完成的。

不管是參加 3 月的專科自主招生還是 6 月的統一高考，當專科成為不得不面臨的選項時，由於前面所述的對本科高等教育和專科高等教育在價值上的判斷不同，本科和專科的教育資源與就業前景亦有差異，這些學生及其家長多少還是顯得有些無奈。

高等教育擴招之後，原本在精英體制中可能被淘汰的學生現在有機會進入這個體系，但他們進入的是這個體系中最底層的教育機構或者專業，正如 Bourdieu & Passeron (1977) 所言：「當考試似乎要淘汰他們的時候，只需把這種放逐到二流專業所造成的另一種自我淘汰認作延遲淘汰」（p. 153）；「作為延遲淘汰的機制，各階級的學習機會與不同專業和學校提供的以後成功的機會的結合，便把一種社會方面的不平等變成了一種純粹是學校方面的不平等」（p. 158）。

### 獲得信息：官方信息與小道消息

選擇學校是自我學業表現與學校檔次的一個匹配過程，自我學業表現相對較容易了解，在平時的考試中，學校會劃分數線，幫助學生不斷「定位」自己：

在高三上學期就特別特別好嘛，老師就覺得我是北大、清華的那種學生，肯定能摸個高。我們那就分第一梯隊、第二梯隊，我是第一梯隊的，我們老師就覺得你肯定去北大，要不就去香港，去不了香港就去北大唄。（FSF）

當時老師跟我說就在懸崖邊上，要麼二本<sup>4</sup>要麼就是大專。老師都看得出。（XSM）

通過考試和標籤，不僅「過關者」(passed)和「失敗者」(failed)兩種對立的形象被塑造出來(Bourdieu & Passeron, 1977, p. 153)，更進一步地，過關者被細分成不同梯隊，失敗者被細分成已經失敗的和很有可能失敗的。根據不同的陣營，學生獲得不同的「關懷」，過關者得到肯定和鼓勵，失敗者遭到否定和勸阻。

了解學校信息的過程要複雜得多。有研究者把高等教育選擇過程中的信息分為非正式信息(hot knowledge)和正式信息(cold knowledge)，前者是指通過小道消息獲得的有關高等教育的知識，後者是指官方正式發布的消息；他們同時指出中產階級用官方信息作為小道消息的補充，工人階級則主要依靠小道消息(Hutchings, 2003)。本研究的訪談資料所展示的情況則不同，官方的宣傳資料、網絡、《報考指南》之類的書籍是相對比較容易獲取的信息渠道，無論家庭背景如何，這些學生基本上都有機會通過這些平台對高等教育機構有基本了解：

我查過這兩個學校，杭州那個學校是比較不錯的……上百度查一下，還有長春大學，我都上百度搜了。(GHM)

學校發的手冊，各個大學其實也去我們學校做宣傳，做宣傳的時候就可以在我們學校的官網或者黑板上看到。(HHF)

我們的當時是有那樣的志願書，上面會寫這個學校在我們那邊招了多少學生，然後我就會去看他們學校怎麼樣。(XLF)

與官方信息不同，小道消息常常可以提供更豐富、全面的信息。當然，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大家都有小道消息，但消息的質量不同(Reay, David, et al., 2005, p. 153)。有能力、有資源的家長，或者通過他們認識的熟人，往往能獲取一些高質量的內部信息，這些信息的來源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信息的可信度，彌補了官方信息的不足：

原來一直想上P大學，比較切實的目標是R大學，後來發現R大學不靠譜……家裏面認識[R大學裏的老師]，還有他們去學校宣講……後來覺得F大學還是蠻不錯的，[通過]F大學的對外宣傳，還有家裏也認識一些[F大學的]老師。(FYM)

因為我媽媽以前是做人事的，就對這種招生比較了解。一般性學校好不好，都是我媽媽跟我說的，因為她招生嘛，所以她就會去各個大學。她對大學比較了解，這種排名啊，都是她告訴我的，我本來就不知道的嘛。(HFF)

我爸[在我]報志願那兩天、三天沒上班，坐在家裏算啊……後來我爸就問了一些學長吧，朋友的孩子，他也是這邊[T大學]醫學院的，現在研究生了吧，可能以前

報志願有經驗……打電話給這邊，有一個阿姨，認識一些 N 大學的教授，就諮詢，給我點建議。(TZF)

面對名目繁多的招生項目，高等教育選擇就像一場規則複雜的遊戲；這些通過家長或者熟人建立起來的對大學的了解正有一種「遊戲的感覺」(feel for the game)，幫助他們更有把握地贏得競爭。

## 選擇專業

### 興趣還是就業？

選擇了一個專業就決定了大學四年將要學習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亦與未來可能從事的職業有關。不少學生還是把興趣作選擇的首要依據，而且在具體選擇之前就知道了自己的興趣點所在，對將要學習的專業有自己的了解：

可能我從小就很喜歡人文方面的書籍吧，我小時我媽就讓我背很多詩，家裏擺的都是人文類的書。從小就受到這個熏陶，寫作我也很擅長，在這方面我有優勢，自然而然也會喜歡這一類。高中上理科的時候我就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學習人文類方面的知識，所以對中文系還是蠻嚮往的。(FYF)

我覺得我比較適合政治和經濟，一個是我自己的了解，一個是周圍人對我的[評價]。因為說到這兩個話題我的思維會比較敏捷，興趣會比較強烈。有時候會有一種直覺。後來發現望道計劃之後想了一下，覺得學歷史還是蠻好的，因為本科階段學點比較基礎的學科，對整个人生觀、世界觀的培養各方面比較好。(FYM)

參與本研究訪談的學生涉及到的專業有限，不能代表與他們家庭背景類似的學生選擇專業的整體情況，但是從他們決策時的考慮可以看出家庭背景對其專業選擇的影響。FYF、FYM 選擇的分別是中文和歷史，根據調查，無論是從簽約時的收入水平還是三年後的收入水平，這些基礎學科都不是最「能賺錢」的專業。<sup>5</sup> 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對自己的學業有更長期的規劃，視本科生階段的學習為今後進一步開展專業研究的基礎。較為優越的家庭背景，令他們有機會繼續深造，而不是一畢業就要工作賺錢。

對於有學習能力但家庭背景並不優越的學生來說，他們把大學視作社會流動的工具，可能會選擇那些能夠獲得更高經濟收益的「好就業」的專業，比如經濟類、管理類和工科專業。SZM 的父母離婚，他從小就寄養在姑姑和姑父家，姑姑、姑父和兩個表哥都是工人，他們對 SZM 選專業的建議就是以實用為主：

家裏人是這麼幾個想法，主要還是要看就業，就是以後一定要好就業，如果要讀研的話也要讀那種……就是要適應於社會，然後他們給我幾個方向，一種是經濟類的，還有管理類的，還有是那種非常實用的，像土木工程那種，或者學醫，就這四個選擇。  
(SZM)

本研究所得的結果，跟美國一項青年追蹤調查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結果類似：家庭背景對學生選擇高經濟回報的專業有負向的顯著影響，亦即是說，家庭背景優越的學生反而傾向於選擇沒有高經濟回報的那些專業（Davies & Guppy, 1997）。在不同國家和社會，高經濟回報的專業及其對應行業可能不同，但在學生選擇專業的傾向及其家庭背景的影響方面，還是出現了跨文化的相似性。

### 專業選擇的限制

即使很清楚自己的興趣所在，並不意味着學生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專業，他們可能面臨的限制來自三方面：家長的反對、學費和招生專業的限制。

HFF 家中的長輩出於保持家庭社會地位的願望，反對她選擇的專業：

因為我剛確定〔專業〕的時候，我爸媽是比較反對的，他們覺得就是有點像小保姆，帶孩子，然後我爺爺奶奶也不是很贊成嘛；我爺爺是工程師，我奶奶是醫生，然後他們就覺得幼兒園老師有點像小保姆嘛，就覺得講出去像中專生、大專生做的，就覺得我們家培養那麼久，怎麼這樣子的。（HFF）

最終，她還是如願選擇了自己喜歡的專業。家長之所以願意妥協，是因為他們已經準備好了退路和備案，從事金融行業的父母，就其專業知識和社會網絡來說，隨時都可以讓她放棄自己所學專業而不用擔心職業發展的問題。

SZF 不喜歡材料和機械工程與自動化這兩個專業，但她來自農民家庭，與更現實的學費問題相比，她還是不情願地把這兩個不喜歡的專業放在了前面：

因為這邊〔國際經濟與貿易〕學費高嘛，就沒把這個放在第一個，第一個填的是甚麼材料，第二個填的是機械工程與自動化，然後第三個才填的這個。<sup>6</sup> 因為我個人的興趣一直就是在經濟這方面的……它們〔前兩個專業〕學費低，而且就業前景好，但是我真不喜歡那個。（SZF）

除了高校招生名額在各個省市分配極為不均等之外，不少學校在一些省市進行招生的專業亦十分有限。WGM 和 WZF 分別來自江西和重慶，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選擇專業，只能在招生名額的專業範圍內作選擇：

這個學校在我們那裏只招三個專業，一個是日語，一個是英語，一個是國際商務。  
(WGM)

這個學校在我們那只有三個專業，對外漢語、國際經濟法律和國際政治。(WZF)

招生數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有多少機會進入某個層次的學校，以至將來可能獲得甚麼樣的收入水平，而這種專業選擇上的限制則進一步將不同生源地的學生進入某些行業的機會固化。由於不同職業在收入和社會聲望上有差異，進而就可能影響學生將來能夠獲得的社會地位與收入水平。

## 討論與總結

在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張、但其內部不斷層級化的今天，優質高等教育機會愈來愈集中且固定在優勢階層的現象開始受到公眾和媒體關注。這種社會背景與教育機會的對應關係只是機會分配的結果，若從微觀角度分析，就會發現學生在機會分配過程中的行動邏輯。

大城市是多數學生追求的目標，對於大城市的考生，留在大城市是個不需要太多思考的決定。對於農村或中小城市的學生，大城市高等教育資源和就業機會的優勢吸引了他們，資源相對匱乏和機會較少的家鄉則被嫌棄。學生對出國留學的考慮超出「推拉」模型包含的因素，涉及到每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對競爭環境的多重認識。

「好學校」亦是學生競相追逐的目標，尖子生重點爭奪的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成績略低的學生至少會努力爭取進入「985」高校或者是「211」高校；成績更差一些的學生被迫選擇資源相對匱乏、價值受到貶損、就業情況較差的職業高校，只是延遲了他們在教育體系被淘汰的命運。在獲取學校信息方面，家庭背景較好的學生擁有相對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信息渠道，以此降低選擇的風險。

選擇專業時，已經形成了明確的學習興趣，或者已經規劃好大學畢業之後要繼續深造的學生，傾向於選擇基礎性學科。而家庭背景較差，主要視大學為社會流動工具但又沒有機會繼續深造的學生，更傾向於選擇實用性強、好就業、能賺錢的學科。除了興趣和就業需要，許多學生還受到高校招生專業的限制。

由於這些影響因素，高等教育選擇行動只是在形式上具備了理性選擇理論所需的要素，設定一個目標（城市、學校、專業），收集相關信息為證據，基於信息形成對自己和所處環境的信念，即對於事實是甚麼的判斷，最後選取最佳行動方案用以達成目標。但在影響因素作用下，選擇行動中的欲望（目標）不僅包括源自激情的理想目標，亦包括受限於結構性因素的現實目標，目標的形成有時並不指向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對象徵性資本的追求。行動者的信念延續不僅建基於理性的計算，更

依賴於一種自動機制（即慣習），使得這種信念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就「自動」適應了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條件，進而成為行動者眼中毋須置疑的事實。以之作選擇依據的證據（信息）很難達到完全理性選擇所要求的最優化程度，學生獲得信息的難度和信息的質量是有差異的。

Bourdieu（1977, 1990）的實踐邏輯理論關注的是在具體情境下，這些結構性因素如何通過慣習作用於行動者的決策和行為，因此可以在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上，為學生的高等教育選擇行動提供更深入的理論解釋。

社會背景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之間的對應關係之所以形成，與每一個體有關，個體身為實踐的行動者時刻參與其中。行動者不僅時刻受到來自不均等結構的影響，同時亦促使這個不均等結構進一步形成。因此，突破這局面要從結構（即資源分配和流動機制）和行動者（慣習的形成與改變）兩方面入手。只關注結構就會形成獲得入學名額就能改變命運的幻想，只關注行動者則會過分強調個人的努力、奮鬥，而推卸政府和政策在促進社會流動、優化社會結構方面的責任。

本研究所關注的高等教育選擇主要與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均等有關，在後續研究中有必要關注更多高等教育的過程，即學生在大學中的教育經驗和生活感受，以及關注更多高等教育的結果，即學生能力與人格的成長和進一步的學業深造及就業情況。

## 註釋

1. 「985」工程是為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和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高等教育建設工程；「211」工程是面向 21 世紀在全國範圍內重點建設約 100 所高等學校和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截至目前，中國內地共有 39 所「985」高校和 112 所「211」高校。「985」和「211」工程高校獲社會各界認為是教育質量較好的高校。
2. Bourdieu（1997）界定的文化資本包括三種形式：具體形式（*embodied state*）的文化資本，指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客觀形式（*objectified state*）的文化資本，指文化商品；體制形式（*institutionalized state*）的文化資本，指證書、文憑等。
3. 「分房子」指的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使用的房屋分配形式，一般是根據單位裏職工的級別、年齡、家庭人數、住房情況等，分配具有優劣等級之分的房屋。
4. 分批次錄取是中國內地高等教育招生的慣用方法，學校按照錄取時間給劃分在不同批次。一般來說，錄取順序與高校綜合實力相關，本科第一批招生的學校在全國高校中排名靠前，簡稱為「一本」。民間習慣以「一本」、「二本」、「三本」等指稱不同批次（即不同排名）的高校。
5. 具體數據可參考麥可思數據報告（<http://www.mycos.com.cn/Detail/ArticleDetail?articleID=10513> 和 <http://www.mycos.com.cn/Research/ShowWRD?sn=10261>）。
6. SZF 因為高考成績沒有達到第一志願和第二志願的水平，她最終給分配至第三志願的專業，即學費較高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

## 參考文獻

- 丁小浩 (2006)。〈規模擴大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化〉。《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 4 卷第 2 期，頁 24-33。
- 文東茅 (2005)。〈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 3 卷第 3 期，頁 58-63。
- 王偉宜 (2010)。〈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各階層子女入學機會變遷研究〉。《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 8 卷第 4 期，頁 120-130、190。
- 李春玲 (2005)。〈當代中國社會的聲望分層——職業聲望與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測量〉。《社會學研究》，第 2 期，頁 74-102。
- 侯龍龍、李鋒亮、鄭勤華 (2008)。〈家庭背景對高等教育數量和質量獲得的影響——社會分層的視角〉。《高等教育研究》，第 29 卷第 10 期，頁 39-45。
- 高妙飛 (2007)。《高考志願選擇行為研究——以福建省 A 市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廈門，中國。
- 黃瑋 (2008)。《高考志願決策結構模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南京，中國。
- 楊東平 (2006)。《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實》。北京，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精明 (2006)。〈高等教育擴展與入學機會差異：1978~2003〉。《社會》，第 26 卷第 3 期，頁 158-179。
- 鮑威 (2010)。〈大學的門檻：升學選擇背後的約束因素與分析〉。《教育發展研究》，第 17 期，頁 24-30。
- 謝京輝 (2009)。〈中國城鎮化的區域差異：新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含義〉。《社會科學》，第 6 期，頁 48-55、188。
- 鍾宇平、陸根書 (1999)。〈收費條件下學生選擇高校影響因素分析〉。《高等教育研究》，第 2 期，頁 31-42。
- Andres Bellamy, L. (1992). *Paths on life's way: Destinations, determinants, and decision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 Baxter, A., & Britton, C. (2001). Risk, identity and change: Becoming a mature stud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1(1), 87-102. doi: 10.1080/09620210100200066
- Blau, P. M., &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Wiley.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G. Raymond & M. Adamson, Trans.).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6).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L. C. Clough, Trans.). Oxford, England: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 A. S.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pp. 46–58).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R. Nice, Trans.). London, England: Sage.
- Brooks, R. (2003). Young people's higher education choices: The role of family and frien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4*(3), 283–297. doi: 10.1080/01425690301896
- Chapman, R. G. (1986). Toward a theory of college selection: A model of college search and choice behavior.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3*(1), 246–250.
- Davies, S., & Guppy, N. (1997). Fields of study, college selectivity, and student inequa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Forces, 75*(4), 1417–1438. doi: 10.1093/sf/75.4.1417
- Elster, J.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roux, H. A. (1983). Theories of re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3*(3), 257–293.
- Hanson, K. H., & Litten, L. H. (1982). Mapping the road to academe: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women, men, and the college-selection process.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19*, 179–198.
- Heath, S., Fuller, A., & Johnston, B. (2010). Young people, social capital and network-based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1*(4), 395–411. doi: 10.1080/01425692.2010.484918
- Hossler, D., Braxton, J., & Coopersmith, G. (1989). Understand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In J. C. Smart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5, pp. 231–288). New York, NY: Agathon Press.
- Hossler, D., & Gallagher, K. S. (1987). Studying student college choice: A three-phase model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er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62*(3), 207–221.
- Hutchings, M. (2003). Information, advice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L. Archer, M. Hutchings, & A. Ross (Eds.),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ssues of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pp. 97–118).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Falmer.
- Jackson, G. A. (1982). Public efficiency and private choice in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4*(2), 237–247. doi: 10.3102/01623737004002237
- Kim, J. (2011). Aspiration for global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stratified realm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Why do Korean students go to US graduate school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2*(1), 109–126. doi: 10.1080/01425692.2011.527725
- Lareau, A., & Weininger, E. B. (2008). Cla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A. Lareau & D. Conley (Eds.),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pp. 118–151).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azzarol, T., & Soutar, G. N. (2002). “Push-pul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stination cho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16*(2), 82–90. doi: 10.1108/09513540210418403

- McDonough, P. M. (1997). *Choosing colleges: How social class and schools structure opportuni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ugsley, L. (1998). Throwing your brains at it: Higher education, markets and cho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1), 71–92. doi: 10.1080/0962021980020018
- Reay, D. (1998). “Always knowing” and “never being sure”: Familial and institutional habituses and higher education choice.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3(4), 519–529. doi: 10.1080/0268093980130405
- Reay, D. (2003). Shifting class identities? Social cla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In C. Vincent (Ed.), *Social justice, education and identity* (pp. 51–64).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Falmer.
- Reay, D. (2010). Sociology,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 In M. W. Apple, S. J. Ball, & L. A. Gandin (Eds.),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396–404).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eay, D., David, M. E., & Ball, S. (2005). *Degrees of choice: Social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higher education*. Stoke-on-Trent, England: Trentham.
- Reay, D., Davies, J., David, M., & Ball, S. J. (2001). Choices of degree or degrees of choice? Class, “race”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choice process. *Sociology*, 35(4), 855–874. doi: 10.1177/0038038501035004004
- Sewell, W. H. (1971).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5), 793–8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ssc.wisc.edu/wlsresearch/publications/files/public/Sewell\\_Inequality.Oppportunity.H.E.pdf](http://www.ssc.wisc.edu/wlsresearch/publications/files/public/Sewell_Inequality.Oppportunity.H.E.pdf)
- Sewell, W. H., Haller, A. O., & Portes, A. (1969).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1), 82–92. Retrieved from [http://www.ssc.wisc.edu/wlsresearch/publications/files/public/Sewell-Haller-Portes\\_The.Educational.and.Early.Occupational.Attainment.Process.pdf](http://www.ssc.wisc.edu/wlsresearch/publications/files/public/Sewell-Haller-Portes_The.Educational.and.Early.Occupational.Attainment.Process.pdf)
- Sheng, X. (2012). Cultural capit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school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choice in China. *Gender and Education*, 24(2), 131–146. doi: 10.1080/09540253.2011.582033

## 附錄：訪談提綱舉例

- 簡單介紹教育經歷，學習之外還做些甚麼？
- 為甚麼要上大學？怎麼確定方向的？
- 怎麼選城市、學校和專業的？
- 對結果滿意麼？有沒有調整？
- 怎麼評價選擇的過程和結果？覺得這個選擇對你的成長和發展有甚麼影響？
- 如果讓你重新選擇會怎麼選？為甚麼？
- 從決定上大學到現在你感受最深的是甚麼？為甚麼？
- 怎麼看待上大學這個事情？你覺得上大學能給你帶來甚麼？
- 你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是？

##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Choice

Yuting ZHANG

### *Abstr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witnessed dramatic expansion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expansion, the syste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hierarchical. Based on the logic of practi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gents' practice and the structural impact through interviewing 23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students' desire and belief as well a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llege choice are limited by such structural factors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positional hierarchy in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and family background.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n be applie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lege choice.*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equality of access; college choice; logic of practice*